

IMPERIAL SEALS OF THE
MING & QING DYNASTIES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故宫经典

明清帝后宝玺

故宫博物院编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明清帝后寶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帝后宝玺／徐启宪，李文善，郭福祥编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6重印）（故宫经典）

ISBN 978-7-80047-695-2

I．明… II．①徐…②李…③郭… III．古印（考古）—中国—明清时代—图集 IV．K87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1275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郑欣淼

副主任 李 季 李文儒

委 员 晋宏逵 王亚民 陈丽华 段 勇 肖燕翼

冯乃恩 余 辉 胡 锤 张 荣 胡建中 阎宏斌 宋纪蓉

朱赛虹 章宏伟 赵国英 傅红展 赵 杨 马海轩 娄 伟

故宫经典

明清帝后宝玺

故宫博物院编

顾 问：朱家溍

主 编：徐启宪 李文善

撰 稿：郭福祥 关雪玲 恽丽梅

摄 影：马晓旋

铃 本：郭福祥 关雪玲 恽丽梅

拓 本：郭玉海

图片资料：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白建新

装帧设计：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出版发行：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16 010-85007818 传真：010-65129479

邮箱：ggzjc@vip.sohu.com

制版印刷：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12

印 张：28

字 数：123千字

图 版：820幅

版 次：2008年4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2次印刷

印 数：1,001～2,000册

书 号：ISBN 978-7-80047-695-2

定 价：290.00元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IMPERIAL SEALS OF THE MING & QING DYNASTIES

明清帝后宝玺

故宫博物院编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经典故宫与《故宫经典》

郑欣淼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

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的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写的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故宫经典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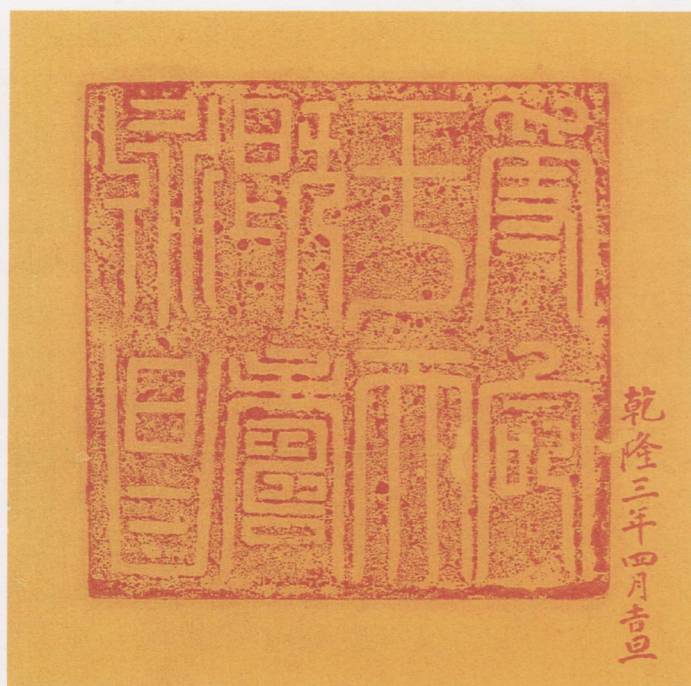
于是，现在就有了紫禁城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随着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这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藉《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含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目 录

002/ 弁言	朱家潘	260/ 道光诸玺	
004/ 壹 明代宝玺	徐启宪	264/ 咸丰诸玺	
008/ 国宝	郭福祥	268/ 同治诸玺	
018/ 御书铃用诸玺	李文善	271/ 光绪诸玺	
020/ 宫殿名玺		275/ 宣统诸玺	
022/ 赞颂天道勤求治理祝语玺		278/ 后妃宝玺	关雪玲
030/ 道篆青词铃用诸玺及佛菩萨图形		280/ 尊号诸宝	
038/ 后妃宝玺	郭福祥	282/ 徽号册宝	
044/ 皇帝升祔庙号谥号册	恽丽梅	286/ 御书铃用诸玺	
048/ 附录 铁券	关雪玲	306/ 帝后升祔庙号谥号册宝	恽丽梅
052/ 贰 清代宝玺	徐启宪	308/ 皇帝升祔庙号谥号册宝	
056/ 国宝	郭福祥	314/ 皇后升祔庙号谥号册宝	
134/ 御书铃用诸玺	郭福祥	318/ 附录 符牌	关雪玲
140/ 宫殿名玺		320/ 兵卫符	
186/ 康熙诸玺		326/ 门禁符	
199/ 雍正诸玺		328/ 后记	
221/ 乾隆诸玺		330/ 出版后记	
244/ 嘉庆诸玺		330/ 再版说明	





后世伪造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

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古者，上之所以示信于天下惟圭璧符节而已。诸侯朝于天子，则执其所受之圭以合焉。战国时人所佩方寸之印皆称玺。秦灭六国统一寰宇，惟皇帝所掌独称玺。秦始皇制六玺，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六玺之外又得蓝田玉，命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制亦六玺。自此以降，魏晋南北朝隋唐，或六玺，或八玺不等，玺文大抵同前。武则天称帝改诸玺皆称宝。唐中宗即位复称玺。玄宗开元六年又称宝。天宝初改玺书为宝书。自此历代相沿皆称宝。至明清两朝则宝玺并称。此宝玺之由来也。

明太祖洪武元年制宝玺凡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祀天地用之。曰皇帝之宝，凡诏若敕用之。曰皇帝行宝立封及赐劳用之。曰皇帝信宝，诏亲王大臣用兵用之。曰天子之宝，祀山川鬼神用之。曰天子行宝，封外国及赐劳用之。曰天子信宝，诏外夷调兵用之。曰制诰之宝，赐敕用之。曰广运之宝，奖谕臣工用之。曰皇帝尊亲之宝，册上尊号用之。曰皇帝亲亲之宝，敕谕亲王用之。曰敬天勤民之宝，奖谕来朝官员用之。有御前之宝，以进御座用之。又有表章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嘉靖时新制七宝，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之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洪武元年所制共为二十四宝，皆玉制。皇后之宝册，金制。皇贵妃以下有册有印。掌宝玺符牌之官，有尚宝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一人，后增至三人。在内设尚宝监，有掌印太监一人，签书、掌司无定员。凡用宝，外尚宝司以揭帖赴尚宝监请旨，至女官尚宝司领取，监视外司用讫，存号簿缴进。有明一代宝玺见之于官书者，如上述。今以官书所载检点故官旧藏明代遗留之宝玺，则佚者十之九，盖以明清之际，宫中曾遭变乱之故耳。然官书所未载之宝玺，尚有大明皇帝之宝、文华殿之宝等诸玺。帝后升祔太庙之

谥册、颁赐功臣之铁券犹有存者，更有嘉靖朝宫中道篆祝釐青词所用诸玺，虽为不经之物，今亦一并编入本册，庶几可见有明一代钤用宝玺之概况。

清代开创之际，宝玺专用满文，既乃改铸，兼用汉文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不一。有大清受命之宝、皇帝之宝、奉天之宝、天子之宝、奉天法祖、亲贤爱民、制诏之宝、广运之宝。康熙以来，历年久乃增至三十九宝，贮于交泰殿宝座之左右以次列。其质有玉，有金，有梅檀香木。玉之品有白玉，有青玉，有碧玉；纽有交龙，有盘龙，有蹲龙。凡诰制敕书当用宝，则内阁请旨而用之。遇大朝宣诏之仪，太和殿设宝案于御座前，大学士一人率学士诣乾清门请皇帝之宝，陈于宝案上正中王公百官行礼毕，大学士捧诏诣宝案前，学士北面用宝讫，乃颁诏布告天下。皇帝还宫，内阁学士捧宝，大学士随后，送至乾清门，交宫殿监正，仍贮于交泰殿。遇皇帝行幸，内阁中书一人，穿吉服，乘马，负皇帝之宝，在华盖前行。如不设卤簿，则常服冠袍，在豹尾枪侍卫班后随行。每岁末封印日洗宝，内阁先期奏闻，至期学士、典籍各一人，赴乾清门接宝。洗毕交宫殿监正，仍贮交泰殿。此三十九宝传至乾隆十一年，重新排定宝玺次序。《御制宝谱》序云：“今交泰殿所贮宝玺，历年既久，纪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爰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并著成谱”云云。又御制盛京尊藏《宝谱》序云：“乾隆十一年春，阅交泰殿所贮诸宝，既详定位置，为文记之。其应别贮者，分别收贮；至其文或复见，及国初行用者，为数凡十。虽不同于见用之宝，而未可与古玩并列。因念盛京为国家发祥地，爰奉此十宝赉送盛京，鐫而藏之”云云。乾隆十三年御制交泰殿《宝谱》序后云：“宝谱成于乾隆十一年丙寅，越三年戊辰，始指授儒臣为清文各篆体书。因思向之国宝、官印，汉文用篆书而清文则用本字，以清文篆体未备也。今既定为篆法，当施之宝印，以昭划一。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清本字传自太宗皇帝时，自是而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

守者，不敢轻易。其檀香木皇帝之宝以下二十有一，则朝仪纶綍所常用，宜从新制，因敕所司一律改铸，与汉篆文相配，并纪之《宝谱》序后”云云。自此以后，除开国时行用之四宝未改铸以外，其余二十一宝皆改满文本字为玉筋篆体满文，与篆体汉文并列行用。至皇太后、皇后金宝，各官妃嫔金印，均为玉筋篆满文，与汉篆文并列焉。

交泰殿所贮二十五宝，自乾隆十三年传至宣统年，未尝增减。乾隆六十年行授受大典，于御案左陈太上皇帝之宝，礼成后并未陈于交泰殿国宝之列。又有光绪年新铸大清帝国之宝于类应属国宝，而均未列入交泰殿。御制《匣衍记》云：“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而涉笔记事之玺，即其次也”云云。故二十五之数既定，虽有新铸，于类应属国宝者，亦不入交泰殿之列。凡涉笔记事之玺，皆分贮各宫殿，如康熙钤用御书之敬天勤民宝，贮于乾清宫西暖阁。乾隆钤用御书之古稀天子宝，贮于东暖阁。五福五代堂宝，则贮于景福宫。凡以宫殿命名诸玺，即贮于各该处所。此类常用之玺多如星云，除御笔、御览、御赏诸玺之外，所铸玺文多引经史奥旨，以寓箴儆，或怡情山水，即景咏怀，方圆大小不一。凡听政寝兴之所，以及园囿之轩馆台榭，咸贮此类宝玺，以备挥毫染翰之用。皇太后、皇后之宝册及各官妃嫔宝或印，皆贮于各本宫。帝后升祔册宝，贮于太庙。诸宝收藏处所大抵如上述。

宝玺之制做，凡御用国宝，皇太后、皇后、皇贵妃金宝、金册，帝后升祔太庙之溢册、宝，俱命儒臣书写，由礼部会同内务府造办处铸金琢玉，承做讫，进呈行用。其涉笔记事诸玺，其石质者，俱命御书处写字人精写，由刻字作刻字匠人双钩顶朱填写镌刻，礼部不与焉。

明清两朝宫中所贮本朝宝玺之外，尚有所谓秦玺者。明弘治十三年，陕西献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礼部尚书傅瀚言：“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失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等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记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

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为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以为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者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貽笑千载。我高皇帝自制一代之玺，文各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何藉此玺哉”云云。明孝宗从其言，却而不用。

乾隆御制交泰殿《宝谱》序云：“交泰殿中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法拙俗，非李斯虫鸟之篆明甚。独玉质莹洁如截肪，方得黍尺四寸四分，厚得方之三，以为良玉不易得则信矣。若论宝，无问非秦玺；即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文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仿古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云云。原藏交泰殿之所谓秦玺，与浚河所得玉玺，皆视为玩器，置之器物库中。故宫旧藏所谓秦玺，其来源始末如上述。虽然明清两朝皆屏而不用，藏之宫中数百年，亦颇为世人所关注，故附于编末，仍视为玩器可也。

故宫旧藏《交泰殿宝谱》、《盛京宝谱》、《宝薮》皆为钤印本，而向未刊行。至于明代宝玺，则未见有钤印成册之宝谱传世。今以故宫所藏明清两代帝后之宝玺，钤印释文成谱。首载国宝，依次为御书钤用诸玺、后妃宝册、帝后升祔庙号谥号宝册，最后为符牌、铁券，以类相从，裒为一编，付影印问世。虽近拾遗订坠之举，而征文存献亦可为明清史研求者之一助欤。惟其间或有谬误，尚冀读者正之是幸。

乙亥年五月二十六日

萧山朱家潜撰并书

中国的印玺，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民族风格，是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印玺按其内容功能可分为两类，一类具有征信作用，包括帝后宝玺、百官印信、政府各衙门关防印记、功臣铁券以及私人姓名字号、斋馆室名印章等。另一类不具征信作用，其内容广泛，形式繁多，有各种图形印、古语印、格言印、诗词印等。这些印玺有的阳文，有的阴文，质地多样，形制各异，用途不一。这类印玺一般称为闲章。

具有征信作用的印玺，至尊至贵者莫过于帝后宝玺。皇帝宝玺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凭证，始于秦始皇的“乘舆六玺”。

秦始皇所制“乘舆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其制皆在方寸之间，螭虎纽。另以蓝田玉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后世相传皆宝之，曰“传国玺”。自此以后，汉、晋及南北朝之宋、齐、梁、陈皆沿六玺及传国玺之制，或琢玉为之，或范金为之。北齐制天子之玺乘并依旧式：“皇帝行玺”封常行诏敕用之，“皇帝之玺”赐诸王书用之，“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将、代召诸刺史用之，并白玉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纽。“天子行玺”册拜外国则用之，“天子之玺”赐诸外国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发兵外国若征召及有事鬼神用之，并黄金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纽。又有“传国玺”，白玉为之，方四寸，螭兽纽上交蟠螭。又有“督摄万机”印，纽以木为之，长尺二寸，广二寸五分，鼻纽组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寸，以印籍缝用。后周皇帝八玺，有“神玺”，有“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皇帝负宸则置神玺于筵前之右，置“传国玺”于筵前之左。六

玺皆白玉为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兽纽。隋制神玺，宝而不用，“受命玺”则封禅用之，其余六玺并用旧制。唐制：天子有“传国玺”及八玺，皆玉为之。“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又重定六玺行用之制，“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书，“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玺皆泥封，遇大朝会则符玺郎进“神玺”、“受命玺”于御座，行幸则合八玺为五輿函封于黄钺之内。延至宋代，屡有增广，大观元年（1107年）置八宝，并设符宝郎四员，隶门下省，二员以中人充，掌宝于禁中。遇朝会则内符宝郎捧宝出授外符宝郎，外符宝郎从宝行警卫之内，朝则分进于御座之前。应合用宝，外符宝郎具奏，请内符宝郎御前请宝，印讫，付外符宝郎承受，宝则归于内。政和七年（1117年）又制“定命宝”，合前为九宝。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其御宝制度乃完备。凡中兴御府所藏御宝计十有四方。一曰“镇国神宝”，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疆”九字为文；二曰“受命宝”，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三曰“天子之宝”；四曰“天子信宝”；五曰“天子行宝”；六曰“皇帝之宝”；七曰“皇帝信宝”；八曰“皇帝行宝”；九曰“大宋受命之宝”；十曰“定命宝”，以“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文；十一曰“大宋受命中兴之宝”，以上皆玉制。十二曰“皇亲钦崇国祀之宝”；十三曰“天下合同之宝”；十四曰“书诏之宝”，以上为金铸。宝之制，一寸二分至九寸不等，螭纽、龙纽不一。宝皆纳于小盥，盥三重，皆饰以金，内设金床、金宝斗、龙钥金锁，覆以绯罗绣帕，载以腰舆、行马。

辽代于穆宗应历二年（952年）诏用得于汴京之旧玉宝，乃后晋遗物，其文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宝”，又有契丹宝，其文不详。受契丹册，符宝郎捧宝置御座东。金灭宋辽，尽得其御宝。《金史·礼志》曰：“凡天子大祀则陈八宝及胜国宝于庭，所以示守也。”继又于皇统五年（1145年）铸金“御前之宝”一，“书诏之宝”一，大定年间又铸“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宣命之宝”、“礼信之宝”，其制径四寸二分，厚一寸四分，纽高一寸九分，字深二分。合八宝及胜国宝，金代御宝凡十四宝。元代，见之文献者只八宝而已，即“传国玺”、“宣命之宝”及“乘輿六玺”。

明以前历代国宝之制大略如上。然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国家宝玺传世者无几。《封泥考略》著录一方“皇帝信玺”封泥拓片，玺仅2.7厘米见方，乃西汉遗物，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方宝文。另《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一方元“皇帝之宝”，文分三行，左行为八思巴文“皇帝”二字，右行为汉文“之宝”二字，中行为梵语“吉祥”二字，宝边长为12.5厘米见方。此二宝文字能延留至今，极为珍贵。

有明一代的皇帝宝玺制度，不外乎历朝皇帝宝玺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下诏制皇帝宝玺。此后相继刻制了十七宝，后因火而毁。嘉靖时，不仅补造了十七宝，而且新制七宝，共计二十四宝，终明一代，沿用不改。即为：“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造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

“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在二十四宝中，只有二十三宝可列出其名。另一宝名无史据可考。明代皇帝的宝玺皆玉制，龙纽，继承了宋元宝玺的形制，但尺寸在明代典制政书中却无记载。根据其承袭古制判断，其尺寸大小应与历代皇帝的宝玺尺寸大体一致。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帝后宝玺中，明代二十四宝原物已不存。究其原因，或失之战乱，或失之灾火，或为清朝所重刻。除二十四宝之外，还有各朝皇帝刻制的宝玺：如：“大明皇帝之宝”、“皇帝之宝”、“大明天子之宝”、“广运之宝”、“御前之宝”、“制造之宝”、“皇帝尊亲之宝”、“钦文之玺”、“勤民之玺”、“奉天勤民之宝”、“成化皇帝之宝”、“大明成化之宝”等。这些宝玺的尺寸都小于二十四宝，大小各异，虽然不是明朝各帝沿用的传世宝玺，但仍具有皇帝宝玺的性质和作用，反映了皇权的地位和权威。

在明代皇帝宝玺中，还有其他具有征信作用的宝玺。如皇帝的御书玺、宫殿玺、收藏玺、封验玺以及死后的谥宝等。这些宝玺数量很多，如：“成化御书之宝”、“天子御书”、“御笔”、“文华殿宝”、“御前谨封”、“御前封完”、“御前密封”、“谨具密封”、“宝藏谨封”、“收藏物件”、“宝藏”、“御药之记”、“御前收记”、“日收物记”、“御前密封之宝”、“密旨封完”等等。除皇帝宝玺外，明代后妃、皇太子及皇太子妃、世子及世子妃、亲郡王及亲郡王妃、公主册玺印，在《明会典》中都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后妃及皇子公主的玺印，故宫现存无多，但从零星的收存中，也可对明宫廷宝玺制度有梗概了解。

以上所述，是明代帝后宝玺中有征信作用的部分，

其中包括有明一代的传世国宝和历朝帝后的个人专用玺。从这些宝玺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明代的宝玺，继承了历代王朝帝王宝玺制度，特别是宋元王朝的宝玺制度。历朝皇帝的宝玺，皆玉制，自秦汉始多螭虎纽，宋以后皆龙纽，称宝玺。每宝都有其具体内容 and 用途，都为皇帝所专用，百官平民都不得使用皇帝宝玺的名称及形制。朱明皇帝的宝玺，名称、形制、质地及用途基本照搬前代之制，但相关规定比前代更具体更严格了。其二，明代皇帝发展了历代宝玺制度，宝玺数量有所增加。秦汉为六玺，唐八玺，至宋辽有十四玺，到明代发展到二十四宝。宝玺内容和名称有了重要变化，除主要宝玺沿用历代宝玺名称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如：明改“受命宝”为“皇帝奉天之宝”，又有“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又有“制诰之宝”、“敕命之宝”、“敬天勤民之宝”、“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命德之宝”等，从而看出皇帝宝玺的内容更具体化了，用途更单一了。其三，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历朝皇帝都刻制了自己的宝玺，或与二十四宝中某玺同名，或冠以某一年号，或另刻新宝，这在明皇帝宝玺中屡见不鲜。这使各方宝玺的用途不再是非常明确的，导致规制混乱，甚至出现了某方宝玺刻而不用的现象。其四，皇宫中大量的宫殿玺、收藏、封记印玺的出现，也说明了大内机构的庞杂和管理的混乱。

在明代皇帝的宝玺中，除具有征信作用的宝玺外，还有大量的不具征信作用的宝玺，社会上称为闲章。在我国，闲章的使用，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较多出现，其内容多以吉祥语入印，故又称为吉语印；同时也出现

了表达处世志向的格言印。这些印形制不一，活泼多样。其后出现的图形印和图字并存印，其内容亦多寓意吉祥如意。图形印，又称肖形印，盛行于两汉及其以后，除龙、凤、虎、蛙、牛、羊、犬、鹤等禽兽外，还有人物形象和人们日常生活场面。闲章刻制发展到宋元，为之一变，脱离了吉语印的传统内容，发展到抒发个人情感和表达文人志向的新阶段。明代更是这一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闲章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刻制吉语印、肖形印，更多地是将经史名言、诗词佳句作为刻制印章的内容。一个流行于社会的文化艺术形式，必然影响着社会各方面。皇宫是封建社会的活动中心，社会上流行的闲章艺术形式很明显地在宫中反映出来，而且形成了它的独有特色。其一，明代皇帝的吉语印与表达皇帝治理国家的理想结合紧密，不再是避邪敬神一般吉语。如：“万邦咸宁”、“乾坤清泰”、“治教休明”、“协和万邦”、“海宇宁谧”、“日月昭明”、“万国来朝”、“德延万世”、“抚御洪规”、“功高宇宙”、“缵承隆运”、“保和太和”等。其二，突出反映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宋元之后，儒、道、释三教不再像唐以前那样的对立和斗争，逐渐合一，相互包融，相互借重。而且，明代皇帝除了毫不放松世俗社会的伦常观念基础儒教之外，于道释两家亦各有所好，或为求仙求寿，或为测秘探微，亦有出于联络边远地区的目的把其作为纽带，总之，皇宫也建立了相当多的佛堂、道场。皇帝宝玺中也明显反映了这一历史特点。如：“三教一家”、“三教宗主”、“明心见性”、“万法归一”、“法轮常转”、“大乘法宝”、“博通经教”、“致知力行”、“宗儒守道”、“真火生丹”、“金宝内炼”、“阴

阳无始”、“紫宸黄道”、“温养沐浴”等。其三，在皇帝的闲章中，出现了大量的诗词。如：“醞酬直上昆仑顶，昼夜河车几万遭”、“草绿花明日，东风春意多。一团清趣处，至治正熙和”、“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堂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成矣”等等。其例举不胜举。其四，发展了古代的肖形印和吉语印。字图结合，有的文字已不再是一般的吉语，而且出现了诗词的形式，内容也更为广泛复杂。如：“五龙捧圣”、“双龙捧寿”玺，边刻龙纹，中刻文字，表示了真龙天子圣寿无疆。“八方光照四海丰登”玺，中间刻上下两组八字，两边刻万字吉磬，表示普天同庆五谷丰登。“四夷献瑞”玺，玺正面刻两夷人赶一瑞兽进贡皇帝，上方刻“四夷献瑞”四字，表现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八方来王。还有一长方玺，中刻一仙人，四周刻诗一首：“道德养丹久，乾坤任化机。苍龙飞竹枝，一气运玄微。”在肖形玺中，除部分禽兽，如：狻猊、马哈兽、仙鹤、羚羊等外，较多的是佛教的金刚佛像，反映了明代统治尊佛扬道的思想。

综上所述，明代帝后宝玺，不论是表示国家最高权力，具有征信作用的包括二十四宝在内的宝玺，还是不具有征信作用的各种闲章，都是中国印玺制度的继续和发展，并具有鲜明的明代皇家宫廷特点，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在宫廷中的反映。我们从明代皇帝的宝玺中，可以了解明代皇帝集权的痕迹和其中思想意识的变化。明代皇帝的宝玺，是我们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宗教史、宫廷史的

重要历史资料。方寸之间存有一个大社会，说明印玺对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故宫博物院现藏明代皇帝玺印的数量虽不如清代的多，但却是明代皇帝宝玺收藏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我们选择了明代皇帝和后妃的部分宝玺，供研究中国印玺者参考，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国宝

 国宝制作与演变。明代国宝之制始肇于朱吴。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丁卯“定开读诏敕仪，前期翰林院判官承制草诏讫，礼部告示百官于皇城守宿。至日，内使监设御座香案于奉天殿，尚宝司设宝案于御座南，用宝案于诏书案东……皇帝皮弁服出，乐作，陛座卷帘，鸣鞭，乐止。礼部官捧诏书至宝案，尚宝司奏用讫，礼部同中书省官用黄销金袱裹之。奏请于午门外开读”。又同卷载册封皇太子时用宝情况：“……内使舁册宝亭，东门出至西道，仪仗鼓吹前迎，百官迎送至东宫，安奉册宝于殿内。初，皇太子降阶，礼部尚书跪奏用宝，诣案捧诏书，尚宝卿用宝，以诏书置于案。礼部尚书于殿西跪奏云：捧诏赴午门开读。”此时正在草创之际，用宝想必仍沿旧例。

 有明一代于洪武元年（1368年）始制宝玺。洪武元年正月庚辰，太祖欲制宝玺而未得玉，有贾胡浮海适至，闻上即位，以美玉来献。云：此于阗宝玉也，自其祖父相传，云当为帝王传国之宝，上喜，以示玉工，果良玉，即命制为玺一、圭一。又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庚子：“造御宝六，白玉三，青玉三。文曰：‘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天子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之宝’。”（《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五）又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五月庚寅：“诏吏部自今诰命丹符许用‘敕命之宝’”（《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九十），知此时已有“敕命之宝”之作。终洪武一朝，国家御宝凡十七。

 十七宝为有明一代世守。正德九年（1514年）甲戌，大内遭火，宝玺皆佚。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始补造。《明世宗实录》载：“甲辰造御宝玺十一颗，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曰‘天子信宝’、曰‘天子行宝’、曰‘皇帝信宝’、曰‘皇帝行宝’、曰‘大明受命之宝’、曰‘巡狩天下之宝’、曰‘垂训之宝’、曰‘命德之宝’、曰‘讨罪安民之宝’、曰‘敕正万邦之宝’。”除“天子信宝”、“天子行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为洪武年间曾制以外，其余七宝皆新制。所有国宝掌于尚宝司者共二十有四，遂成一代定制。

 以后又有世宗补造玉宝之事。《万历野获编》卷二：“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之冬，则世宗已不豫久矣。乃下诏曰：先朝甲戌遇灾，御宝凡六，其五已遭毁，命所司觅美玉补造。”然此事与嘉靖十八年（1539年）造御宝十一颗之载相忤，故沈德符推测曰：“想十七宝者，大半范金为之，而此六玺乃玉制耶？”查《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四亦有类似记载：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壬寅“礼部既进玉，上意未惬，召户部尚书高耀论之曰：祖制五宝用料，三块玉皆不堪，全无光泽，须得美料。西夷贡玉以无价赏多，则其美者，今若以重价访购其上品，当用得耳。”据前述，旧十七宝已于嘉靖十八年补造添齐，何以此时再行补造？待考。

 明二十四宝“其文不同，各有所用”（明郎瑛《七修类稿》），非若隋唐之神玺，藏而不用。兹据有关典籍将明代国宝情况列表于下：

编 号	宝 名	用 途	典 籍	备 注
一	皇帝奉天之宝	祀天地、郊天齐醮	《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明官史·木集》	为唐宋之传玺
二	皇帝之宝	诏与敕	《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	
三	皇帝行宝	册封、赐劳	同上	
四	皇帝信宝	诏亲王、大臣及调兵	同上	
五	天子之宝	祀山川、鬼神	同上	
六	天子行宝	封外国及赐劳	同上	
七	天子信宝	召外服及征发	同上	
八	皇帝尊亲之宝	上尊号	《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明官史·木集》	
九	皇帝亲亲之宝	论亲王与藩府	同上	有大小二颗
十	制造之宝	诏用；一品至五品诰命用	同上	用之最多
十一	敕命之宝	敕用；六品至九品用之	同上	同上
十二	广运之宝	奖励臣工	同上	同上
十三	敬天勤民之宝	敕论朝觐官	《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	
十四	御前之宝	图书、文史等用之；宫中库藏箱锁用	《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明官史·木集》	

十五	表彰经史之宝	图书文史等用之	《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	
十六	钦文之玺	同上	同上	
十七	丹符出验四方	凡敕命远出者，用一黄纸封套，上下悉用此玺封识	《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二；《明史》卷六十八；《明宫史·木集》	
十八	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		《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	世宗增制
十九	大明受命之宝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十	巡狩天下之宝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十一	垂训之宝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十二	命德之宝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十三	讨罪安民之宝	同上	同上	同上
二十四	敕正万民之宝	同上	同上	同上

掌宝机构。宝者，人君所以信其令于天下者也。人君之于宝则设官以守之，以慎其令也。

吴元年曾设符玺郎，专掌宝玺，秩正七品。后置尚宝司，为正三品衙门，设卿、少卿、丞。洪武元年，改为正五品衙门，置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二人。明代诸帝于尚宝司诸职十分重视，视其为亲近侍从。明太祖曾颁《尚宝卿诰》曰：“宝乃乾符也。昔列圣握而统寰宇，故为神器，特谨以示信，然非忠勤无伪之士，安可职于尚宝者耶？今命尔某为朕尚宝某官，尔当宵昼慎恭，使事密而隐，机潜而发，方可周旋于左右，尔其敬哉！”（《明太祖集》卷九）因之此官之选至慎。“国初类以文学儒臣领其职，或兼秩焉。尚书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调，勋辅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补丞，他流所弗与焉。”（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

尚宝司诸官除掌前述二十四宝而辨其所用外，亦负责掌管稽查：（一）守卫金牌：有仁、义、礼、智、信五种。

以给勋戚侍卫之扈从及班值者、巡朝者、夜宿卫者佩带。（二）半字铜符：有承、东、西，北四种，以给巡城守卫者。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点察焉。（三）令牌：有申、金、木、土、火、水六种。以给金吾诸卫及五城之警夜者。（四）铜牌：一种，以稽守卒，曰勇。（五）牙牌：有勋、亲、文、武、乐五种，朝参官员出入佩之。（六）祭牌：有陪、供、执三种，以给陪祀官、供事官、执事人佩带。（七）双鱼铜牌：二种。给宿直卫锦衣校尉之止直者曰严，给光禄胥役之供事者曰善。（八）符验。有马、水、达、通、信五种，为官员使用马、船之凭据。这些宝玺符牌“俱系朝廷信物，机密所在，关系匪轻”（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六），而尚宝司“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数，其职至迩，其事至重也。”（《明史》卷七十四）按明代官制，尚宝司诸官品秩不高，然其职掌及作用实不可忽略。

与尚宝司同时，明代官禁之宦官中，设有尚宝监，其定制演变如下表：

时 间	名 称	品 秩	备 注
吴元年	尚宝兼守殿奉御	正六品	
洪武二年	尚宝	不详	一人
洪武四年	尚宝	从六品	并授内直郎
洪武十七年	尚宝监令	正七品	一人
	尚宝监丞	从七品	一人
洪武二十八年	尚宝太监	正四品	一人
	左、右少监	从四品	各一人
	左、右监丞	正五品	各一人
	典簿	正六品	一人
	长随、奉御	正六品	



明宣宗《武侯高卧图》卷，铃广运之宝

直至洪武末年，尚宝监之人员设置才正式厘定。设掌印太监一人，金书、掌司则依需要随时增减，无定员。

史载尚宝监职掌为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凡尚宝司所领用之御宝全部囊括其中。此外，御药房之“御药谨封”，其他不常用之宝玺亦在其中。然其与尚宝司皆非具体参与御宝之保存，而是对用宝过程负责。简言之，尚宝监之作用一为桥梁，二为监视。

作为桥梁，尚宝监太监担负着尚宝司与内官司宝女官、尚宝司与皇帝间的沟通任务。作为内宫女史，司宝女官不可能与外朝之尚宝司官员直接接触，若要使御宝

由女官保管场所转至负责使用之尚宝司官手中，其间必须经过可以和这两种人都能接触之尚宝监太监传递。另除常朝时尚宝司官员在御前直接奏请用宝外，若遇有急务或偶发事情需用御宝，尚宝司官员请宝折奏亦不能亲自送达御前，而是要经过尚宝监太监传递，得旨后方能取用御宝。

作为监视机构，尚宝监要参与尚宝司一切用宝程序。“遇用宝，则尚宝司以揭贴赴尚宝监，尚宝监请旨，然后赴内司领取。”“凡各衙门勘合用尽，预编完某字号勘合，开底簿，用宝讫，勘合本司（即尚宝司。下同——引者）收贮，底簿付尚宝监官缴进”，“凡用御宝，俱预编某字号